

研究上海道台的力作

介绍《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90》

熊月之

梁元生教授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90》(*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90*，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下简称《上海道台》)，是研究晚清上海历史的力作。

梁元生，笔名施榆，194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甲等荣誉学士学位、硕士学位，留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1980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后相继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于上海史，梁元生可谓情有独钟，他的硕士论文《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便是有关上海史的题目，至今仍是中文世界研究林乐知的权威著作。

以上海道台作为专门历史研究对象，以前未曾见过。20世纪30年代，蒋慎吾写过一篇《上海道台考略》，那是介绍形形色色上海道台的知识性文章；1972年李国祁写过论文《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变》，此外似无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人做过的题目不一定都有研究价值，但是，读了《上海道台》以后，我们会由衷地叹服，梁元生确实慧眼独具，选题角度巧妙。

《上海道台》分三个部分，九章。开头两章为背景性介绍，第一章，总述；第二章，上海道台：背景，官府与人。第一部分：“官员转身对外：上海道台与外国关系”，含三、四两章，第三章为通商口岸的夷务管理：态度与政策，1843-60；第四章，制度架构中的洋务：新体系中的上海道台。第二部分：“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上海道台与近代化”，含五、六两章，第五章，管理近代化：双重角色；第六章，沪津走廊：李鸿章与上海道台。第三部分：“两个世界的中间人：上海道台与地方政治”，含七、八两章，

第七章，精英与城市政治：上海权力结构；第八章，混合社会中的官僚政治领袖：上海道台与精英关系。第九章是总结。

我们知道，晚清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动的转型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一切都处于流转不息、今是昨非、迅速变动之中。梁元生认为，在这个急剧转变的社会里，道台是一个联系人物（Linkage Man），是连接链条上的一环，在外交方面联系中央与地方，文化方面联系传统与近代、精神与物质、东方与西方，职业方面联系商业与文化，社会方面联系精英与大众，行政体制中联系高层与底层。上海道台的位置是个联系位置（Linkage Position），联系不同世界、持不同价值的人是其职分所在。

《上海道台》将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上海，放在剧烈变动的世代与整个中国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延续了好些世纪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凝固的传统在迅速崩解，帝国政府的权力与结构到了崩溃的边缘，朝贡制度渐失引力，天朝心理日趋衰微，儒学结构开始解体。知识分子的历史万能的信念和重建尧舜三代的美梦让位于进化史观，疑古思潮在滋长，许多历史悠久的习惯失去了价值，根深蒂固的制度被推翻。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自我理解的方式正在形成。总之，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变化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向外，将中国政治、文化从孤立状态拉向与国际广泛联系之中；二是向前，强迫中国放弃历史退化观念与复古主义，为近代化而奋斗。上海，就处在这一变迁的漩涡之中。

《上海道台》是将研究对象放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来考察的。

在晚清官僚体制中，道台是个不大不小、不新不旧的官员。

道台一称道员，其职掌有一个变化过程。早在明代景泰年间（1450 - 1457），各省就有驻守或巡视地方的道员。他们原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佐贰，因被派往前元代各道的行政区划内分任各项事务，遂有“道员”之称。其中，布政使司的参政、参议驻守各道，掌管钱谷，被称为分守道；按察使司的副使、佥事分巡各道，掌管刑名，被称为分巡道。此外，还有督粮道、兵备道、驿传道等特别职务的道员，他们与分、巡二道不同，没

有守土之职。清承明制，但有变化。1753年（乾隆十八年），清廷正式在各省设立道员，定其秩为正四品，并将知府改为从四品。从此，道员一职由原来临时性的差遣变为实官，地位介于省、府之间。守、巡两道虽仍其旧称，但已不分职掌。清朝在全国共设分、巡道92员，上海道为其中之一。

上海道正式职称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清廷在苏州、松江两府派设道员始于顺治年间，时称苏松兵巡道，驻于太仓州。1663年（康熙二年），随着常州府的并入，改设分守苏松常道，移驻苏州。此后，该道时撤时设，但与上海县均无行政上之直接关系。1725年（雍正三年），鉴于海禁解除以后商船日增，发生在上海的刑事案件日多，经江苏巡抚张楷奏准朝廷，委派设于苏州的分巡苏松道兼理江海关，上海县始在关务上与苏松道有了直接联系。1730年（雍正八年），海禁大开，上海地位日重，经江苏巡抚尹继善奏请，分巡苏松道加兵备衔移驻上海，上海县从此在巡道的直接监察之下，该道也因此被称为“上海道台”。1736年（乾隆元年）清廷将太仓州划归上海道管辖，上海道的全称乃变成“分巡苏松太兵备道”。

按照一般的情况，地方行政体制分为省、道、府、县四级，上海为县，其上级机构为松江府。在道署从苏州移驻上海以前，上海县也是通过松江府才与苏松道发生联系的。自道署移驻上海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道、县同城，县与府的联系反而不及与道联系近捷；二是因为海关设在上海，道台兼领关务，苏松太道对上海负有特别监管之责，上海县凡遇重大事情必就近请示道员，县、府的行政关系实际上已不及县、道的关系来得密切，驻在上海县城内的苏松太道实质上成了上海知县的顶头上司。

鸦片战争以前，上海道台的职责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监督地方行政。凡苏、松、太两府一州地区内的一切政务，均应由各衙门逐级上报于道，由道台实施监督，并呈送于省。二是维持地方治安。上海道台虽是文官，但作为分巡道兼兵备道，有权节制地方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绿营武职。当地方安宁受到威胁时，他可移牒所在营汛令其出兵弹压。清代上海县驻有江南提督本标右营所属营兵，上海道台在必要时可调动军队，

维持地方治安。三是兼理海关。自从雍正年间江苏巡抚奏请委派苏松道监收江海关税钞以后，上海的海关税务即由上海道兼理。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道台的上述职责未变。但是，随着上海开埠与西人东来，上海道台面临着极端复杂的局面，被赋予更为重要的职权。

其一，面临着极端复杂的局面。上海地处长江口，战略地位重要，一举一动，中外瞩目。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成为中西联系的枢纽，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价值，新的伦理，新的知识，新的生活方式，从西方与日本输入上海，又从这里传向内地和其他城市。紧随巴黎、伦敦之后接踵出现的新式道路，新式码头，新式交通工具，新式建筑与花园，更使上海城市涂上浓重的欧洲色彩。在租界的庇护下，许多新事物在这里生根、发展，其情形宛如在欧洲。激进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自由地表达改革意见，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由此，上海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史无前例的，往往带有全国性和国际性。

其二，办理地方外交。晚清上海是个华洋杂处的开放城市，中外交涉无日不有。为了抚驭外夷，弹压地方，早在1843年，清廷即责成两江督抚督同上海道台负起办理地方外交的全责，并改苏州府督粮同知为松江府海防同知，移驻上海，协同处理外交事务。当时中央没有专门办理外交的机构，地方督抚视办理夷务为畏途。关于上海开埠的具体谈判便是在上海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之间进行的，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都没有直接出面，表面理由是他们与外国领事官位悬殊，不便出面。其后，关于租界的辟设、扩展，关于教案的处理，都主要由道台出面。上海道台实际上成了上海地区外交长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开放日多，华洋交涉益见繁剧。根据条约规定，在通商口岸，领事官、署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署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为此，清政府在各口岸派设道员，兼理海关及华洋交涉事宜，办理地方外交从此成了各口岸道员（包括上海道台）的重要兼职。上海凡有涉外事件，下官照例禀报道台，由道台照会外国驻沪领事。租界的外国人如有事涉及华界，也通常由领事照会道台。

最常见的交涉事件有租地造屋、筑路建桥、收捐征税、案件会审等。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涉外事务，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上海道特在租界租赁洋商房屋，作为谈判交涉之地，是为洋务局。

其三，领导地方洋务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开始推行自强新政，习称洋务运动，上海是开展这一运动的主要城市，上海道台成了地方洋务活动的领导人。他不仅要奉命主持清政府创办的最大的军事企业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还担负着向总理衙门和通商大臣提供各种包括中外新闻纸在内的与外交有关的情报资料的责任。当清政府派遣的外交使团组成以后，上海道署被要求为使团核算出使经费，并向两江总督转交驻外使节发来的函电。

其四，行政问题与海关问题都变得异常复杂。鸦片战争以前，上海道台也管理地方行政与海关，但那比较简单。1845年租界出现以后，特别是1854年华洋混处以后，行政问题变得更为麻烦了。南市华界的事务需要管理自不用说，租界华人的事务也要管理，但其权又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海关方面，1850年代以后，海关聘请洋员为税务司，加之上海变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事务远比以往复杂。

迅速变动的时代，不断扩大的职权，日益重要的地位，使得上海道台不同于一般地方的道台。他之所以成为上面所说的联系中外、商业与文化、上层与底层的人物，与他所处的位置和职责有直接的关联。

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和权力结构下，《上海道台》仔细考察了上海道台的应对措施。

书中考察了上海道台在外交方面的活动与作用，说明他如何在传统的天朝中心观念与新的国际观念两方面发生联系。作者仔细研究了上海道台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能力与不同时期的特点，认为1860年以前是一个阶段，1861年以后又是一个阶段。在1860年以前，中央对于外交没有统一的机构，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与广州的地方官员各凭自己的经验、文化背景和办事能力，处理各自遇到的“夷务”，自由度很大。书中认为，上海道台从宫慕

久、咸龄、麟桂到吴健彰，在外交方面，没有近代外交意识，没有一以贯之的方针与政策，各随己意，自行处置，结果吃亏甚巨，在租界、海关等问题上尤为突出。1861年以后，随着总理衙门与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中央有了专门的外交机构，上海道台在外交方面不再拥有以往那么大的便可行事的权力，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负有监督海关、接待外国驻沪领事、向外国人发放护照、向总理衙门和通商大臣提供外事情报、译送外国报纸、报告在沪外国商人、传教士活动等义务。

在对外态度方面，书中认为，1860年代以后的上海道台一般都是既与外国人友好相处，又有文化优越感，力争对上海管辖的主权，努力维护中国的主权。丁日昌是办洋务的热心人，但力争对“常胜军”的控制权；冯焌光雇佣外国专家到江南制造局工作，但反对英人违反条约规定擅筑吴淞铁路；刘瑞芬在电力控制权方面与冯有类似举动。

书中分析了上海道台在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中的作用与影响，分析了他们在上海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指出他们实际上担当了近代化实行者的角色。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立以后，上海道台例兼督办，一切人事、经济、行政大权均由其执掌，包括向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报告局务、购买设备、聘用职员（包括洋员）、管理附属的广方言馆等。

办洋务是上海道台的重要职责，上海道台的位置上培养了一批洋务人才。从1876年到1911年，共有六名上海道台先后被任命为出使大臣或全权谈判代表，如刘瑞芬、龚照璠、蔡钧。至于在上海担任候补道或在上海有关机构如江南制造局中工作过而后担任出使大臣的人更多，如郑藻如、李凤苞等。在晚清最后二十多年中，上海道台衙门几乎成了出使大臣的阶梯。

书中最为精彩的地方，我以为是对上海道台身分双重性的分析。

书中指出，19世纪后期，上海道台在任时多是比较开明的官员，他们认识到西方武器和技术的先进，明了中外条约内容和国际法知识，其中多数人负责过近代企业。冯焌光、刘瑞芬都支持江南制造局的技术革新，都

有比较丰富的关于西方军火的知识和管理兵工厂的经验，冯可能还是较早考虑经济近代化的人。两人都懂得近代报刊的重要性，办过《沪报》。

但是，另外一面，即自 1860 年代丁日昌以后，到 1884 年中法战争以前的上海道台，除了个别人稍有不同，绝大多数对城市现代化活动持否定意见，在他们日后的经历中，多不再倡导现代化或不再鼓吹支持新式工业、新式教育和其他新式事业。应宝时在任期间，对引进现代工业并不热心，坚决反对修造铁路，他的著名的修筑铁路“七不可”的说法广为流传，退位以后，在家乡杭州主要从事慈善活动与土地方面的经营，不再是一个近代化指导者的角色，由一洋务要员回归地方士绅角色。涂宗瀛在道台任上时，支持李鸿章办洋务，负责江南制造局的管理，颇为得体，但他离开上海道台以后，尽管历任广西巡抚、湖南巡抚和湖广总督，更有权力从事近代化活动，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精力放在提倡传统的学问方面，更多地强调传统的价值和道德。涂的继任人沈秉成与涂如出一辙，在由上海道台晋升内阁学士、广西巡抚、江苏巡抚等职后，很少参与近代化事业，退休以后，在南京吟诗作画，俨然一传统士绅。冯焌光反对建设吴淞铁路，铁路建成以后仍持反对态度；邵友濂强烈反对上海丝厂、棉纺厂使用西方机器；刘瑞芬反对兴办煤气厂和电厂，担心这种设备带来火患。当然，1885 年中法战争以后的上海道台情况有所不同，龚照瑗、聂缉槩都不反对近代化，热心洋务，被称为“温和的近代化者”。

在近代化问题上，如何解释上海道台既是实行者又是消极者或反对者呢？

梁元生认为，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都是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上海道台这一特殊身份的作用。一方面，作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的官员，作为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长官，道台比别的地方官员都更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武器和技术的先进性，对西方社会也有较多的了解，不得不努力从事江南制造局等新式企业的管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传统的地方官员，他的责任是管理地方的治安、行政、教育和民生福利，地方的稳定

是他最大的心愿，这些责任与传统的文化、道德是一致的，那些引进先进机器而带来的中外交涉问题、失业问题、流民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都只会带来更多麻烦。上海道台的既管理近代化企业、又管理近代化城市的这种双重角色，决定了他的矛盾态度。1885年以后，当近代化问题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倡导，越来越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以后，上海道台在近代化方面否定性的角色也就不复存在了。

书中还研究了上海道台如何作为一个联系人或联系的位置在传统的士绅阶层与新兴的商人阶层之间发挥作用。上海社会存在两个精英集团，地方士绅集团是居指导地位的精英，控制文化资源；商人集团是经济精英，控制财富。上海地方官员则是统治精英，控制政治权力。道台，作为上海地方控制政治权力的代表，既与商人集团发生联系，也与地方精英集团发生联系。

《上海道台》也研究了李鸿章与上海道台之间的关系。作者否定了上海道台是李鸿章派系人物的看法，那种看法认为李鸿章实际上控制着对上海道台的任命权。作者认为，尽管不少上海道台曾经是曾国藩或李鸿章的幕僚，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们是李鸿章的同伙。比如，冯焌光曾是李鸿章的经济幕友，但他并非在什么问题上都支持李鸿章的政策。不少人出任上海道台，并非出于李鸿章的推荐，如涂宗瀛是曾国藩推荐的，龚照璠是刘坤一推荐的，冯焌光、沈秉成、邵友濂、聂缉槩等也不是出于李鸿章的荐举，他们与李鸿章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私人关系。

如同一般西文史学著作那样，叙述一段具体历史之后，往往要归纳出某个比较宏观的结论，亦即以小见大，梁元生在《上海道台》的结论部分，揭明了自己的理论贡献：其一，集中研究上海道台，对于了解晚清政府应变能力有重要意义。以前，学术界许多人认为，清政府是僵死的、顽固不化的，是现代化、革新和变法的障碍。研究了上海道台，可以认为清政府在新形势下是有一定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的，上海道台职能的渐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二，上海道台是一个社会联系人物，这是全书的要旨。作

者认为，联系人物或联系位置的概念，对于研究变动中的社会很有用，比如研究通商口岸，那里新旧观念并存、现代与传统价值共在、东西方制度混合，通过研究道台或买办或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这类联系人物或联系位置，可以看清两种文化、两种制度相遇时的冲突和妥协、紧张和韧性。

此外，书中附有 34 张表格，其中有一些是专为对道台作量化分析而作，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扎实的资料功夫和深厚的学术功力。这些表格，对开埠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上海道台的任职时间、任职年龄、离职后的去向、籍贯等方面作了统计分析。统计表显示，1730-1842 年的上海道台，任职在 3-6 年的有 8 人，而 1843-1911 只有两人；前一时期的上海道台日后成为总督或巡抚的共 4 人，后一时期共有 9 人；前期担任过上海道台的官员，约有 42% 最终得以升迁，而在后期，这个比例上升到 63.3%。前一时期上海道台任职开始的年龄，平均 50.2 岁，后一时期的平均年龄是 48 岁；前一时期，上海道台中有进士功名的为 23 人，后一时期只有 5 人，相反，后一时期由举人或军功而任上海道台的数量比前一时期明显增多，且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上海道台在出任以前，都有在上海当候补道或在江苏等邻近地区任职的经历。在上海道台中，汉人的比重在鸦片战争以后较鸦片战争前明显增加，由原来的 70% 上升为 87%。其中，除了浙江人占 20% 仍居首位以外，广东、湖南籍道台的比例提高最快，分别由原来的 0% 与 4% 上升为 17%，取代了以前的山东人与河南人。从统计表上也可以看出，开埠以后的上海道台，比以前更换更频繁、更年轻，更重视个人的能力与经验，在中国政坛上也更受重视。

总之，《上海道台》是资料极为翔实、视角特别、方法新颖、很有理论创造力的著作，对于了解晚清上海社会，拓宽上海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价值。

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第

612—70 页。